

文人吃客

何菲

江南谱系的才子才女们,很少有不爱吃和不会吃的。吃编织起世情的经纬,也见证了人情冷暖。

浙江富阳人郁达夫幼年贫穷匮乏,但富春江的鱼虾给了他敏感的味道基因。成年后他逐渐富裕,美食嗜好得以满足,也有了后来觥筹交错的酒席生涯。他胃口极佳,一餐能吃甲鱼或童子鸡一只。每年海蚌肥美的季节,红烧白煮,能吃上几百个。他讲究早餐小菜:荷包蛋、油余花生米、松花蛋……他擅饮,是鲁迅最重要的酒友,五马路川味饭店、陶乐春等是他们常去之处。辣鱼粉皮,砂锅豆腐、炒腰花、绍兴酒都是常点的酒菜。就连他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时,也是在酒楼的饭桌上。他初识王映霞后,短短六天吃了六次,喝醉五次,推杯换盏,谈了许多氤氲衷曲。

王映霞在与郁达夫婚后洗手做汤羹,火腿蒸甲鱼是拿手菜,还学会了当年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喝的味噌汤,这是他宿醉后常饮的醒酒汤。当时他们每月开支200银圆,几乎有一半花在吃上。与郁达夫离婚后,王映霞就再也没有做过味噌汤。

虾蟳羹是海宁人徐志摩的最爱,但凡他回乡,必

点这道菜。还有桂花煮的糖水栗子。后来有海宁名厨根据徐志摩笔下美食琢磨出一套“志摩宴”。徐志摩在饮食口味上不脱浙江人的清淡,爱吃鱼虾豆腐,爱喝龙井茶。而常州人陆小曼则终日零食不离手,杨梅、樱桃、荔枝、橘子、西点、酒心巧克力……徐志摩曾想方设法弄来好吃的博她开心,也曾抱怨她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合上眼之前都在吃,靠零食果腹。

河北籍上海人张爱玲很喜欢豆制品、大饼油条、冰激凌、豆沙馅之类。“豆腐渣浇上吃剩的红烧肉汤汁一炒,就是一碗好菜,可见它吸收肉味之敏感。”记得张爱玲某篇文章里写过,香港沦陷后食物匮乏,她和当时闺蜜炎樱满大街寻找冰激凌。只有一家店答应明天或许有。第二天张爱玲步行十多里,总算吃到一盘昂贵的、全是冰屑子的冰激凌。

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是宁波人,她爱吃咸蟹和毛笋。苏青笔下盐烤笋的烹制很有趣味。烹成后的盐烤笋“看起来上面有一层白盐花,食也不太咸,吃时可以用上好麻油蘸着吃,真是怪可口的。”

无锡人钱锺书本质上是写人性的作家,他善于在饮食中窥见政治之道、哲学之道、为人之道,比如施一饭招恩,吝一饭招怨,比如对美食美器的看法。钱锺书不擅长做美食,可无论去什么馆子,他总能



亦是烁艳

(纸本设色) 吕吉人

点到好菜。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,一眼看到全部,又从中选出最好的,钱锺书很擅长。

胡适是安徽绩溪人,与他清朗俊逸的形象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厚腻口味。他喜食肥肉,红烧青鱼头尾,红烧草鱼划水。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后,炒豆腐脑深得他青睐,因为他喜欢重油,吃豆腐菜要用猪油鸡油几番翻炒,油润细嫩。

梁实秋第一次

去胡适家做客,胡适夫人江冬秀亲自下厨烹制了绩溪名菜徽州一品锅。这是一道硬菜。口径两尺的铁锅里摆了数层食材,第一层是蒲菜叶子,第二层是煎过的鸭块,三层是卤鸡块,四层是蛋饺,五层是油豆腐,六层是五花肉,底层铺满徽州竹笋……从上到下,滋味层层递进,丰腴适口。梁实秋吃后赞不绝口,据说蔡元培也曾有幸

品尝。

绍兴人鲁迅口味重,喜食辣,认为吃辣可以发汗解困,也因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气候寒冷,没有余钱做厚实冬衣,也就开始以辣椒御寒了。

鲁迅先生对于隔夜菜是不大欢喜吃的,只有火腿连用几次也可以。后来萧红萧军等人也时常去鲁迅家蹭饭,许广平总是七大碗八大碗烧。鲁迅常常写作到深夜,家里常备核桃花生等坚果和糕点饼干。来上海定居后,如果午夜时许广平能给他预备些东西吃,比如绍兴农家烧法的蛋炒饭,放些葱,蛋和饭都炒得较硬些,再有半杯酒,他会十分满足。鲁迅的酒量不大却总爱喝一点,在北京是白干,到了上海主要是黄酒,五加皮、白玫瑰、啤酒、白兰地也喝一点。鲁迅一生始终维持着学生和战士的生活,有着中国人传统的克己美德。他自己的一切享用都是很刻苦的,许广平说,“记不得有谁说

过,鲁迅的生活,是精神重于物质……一起床就开始工作,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,也不过两三种饭菜,半杯薄酒而已。”

在上海的时光,鲁迅

算起来,梅子涵老师今年有七十四岁了。

我认识梅子涵老师是2007年,那时他只有58岁。

16年的光阴,好像没有

父亲走得那么突然,因为车祸,什么也没留下。到了知天命的岁数,我不恐惧死亡,但却害怕告别。

大险当日,我没有选择哀乐,而是用一首蒙古族民歌,为父亲送行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,父亲晚年喜爱上了泡KTV,去唱歌时,每每必点,他曾对我说,听到这首歌,就好像回到了天峻,那是他魂牵梦萦的草原。

儿时,对父亲的记忆最深的便是门前拴着的马。那是爸爸的交通工具,天峻草原深处的牧区生活,马是主人远行或归家的信号,和信件一样有特殊的意义。遇到大雪封山,在家门口守候下乡归来的父亲,看一看那矫健的身姿,是一种痴痴的念想。父亲和草原的不解之缘起始于1958年,尚在读高中的父亲毅然响应国家的号召,奔赴柴达木盆地,投身祖国大西北建设,在那里认识了母亲,一起组建了家庭,从大柴旦、天峻一路干到德令哈,走过了激情岁月,走过了动乱年代,走过了开放时期,亲眼见证了荒漠变绿洲,目送着儿女成长。作为共和国支边的那一代,都背负着长子的责任;作为新中国最早“走西口”的上海人,又有着细腻的情怀。当年,他和母亲用微薄的高原工资和补贴,同时养育着沪、青、川三地多个家庭的子女,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空,儿女出门在外,亲人两地分居,父亲总不忘叮咛和嘱托,骨肉长大成人,家族薪火传承,他为我们弟兄仁起的名字,都带有三点“水”,常常告诫我们,我们从小喝着青海湖和黄浦江的水长大,无论走到哪里,都不能忘记。从上海到青海,从青海到上海,这个来回,父亲携着母亲的手,走了近半个世纪。

父亲晚年退休在上海,但是,说起大西北的往事,总是清晰如昨。他最喜欢草原上的“蹄花”,流淌在天峻草原的布哈河,是一条同时养育着蒙古族、藏族和哈萨克族兄弟的母亲河,复牧场繁花似锦,冬牧场千里银装,草原上有看不尽的野花,说不完的故事。20世纪50年代的边疆生活,堪称血浓于水的大融合。父

穿着许广平织的大V领毛背心,吃着她精心料理的家常美馐,度过了人生中最温馨的9年,也是最后的9年。

梁实秋虽说出生在北京,却是浙江省杭县(今杭州)人,他的味觉颗粒度之精细,带有江南人的遗传密码。他最爱信远斋的蜜饯、糖葫芦和致美斋的爆羊肚。1926年他留美三

年归国,刚下车,将行李寄存车站,就直奔致美斋,一口气吃了三种爆肚。他说,在海外想吃的家乡菜,以爆肚为第一。我最爱看他写寻常食物,比如写鸡蛋饼,“北方人贫苦,如果有两张家常饼,配上一盘摊鸡蛋(鸡蛋要摊成直径和饼一样大的两片),把蛋放在饼上,卷起来,竖立

直,双手扶着,张开大嘴,左一口、右一口,中间再一口,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一顿丰盛大餐。”

梁实秋最好的美食文章,不是现写的,而是回忆的。回忆自带滤镜,使得食物的迷人因乡土情怀而无限放大。他46岁到中国台湾地区,直至84岁去世,一别半生,再也无缘故土。于是当年的一杯一箸一蔬一食,都成为他思乡的引擎。

咖啡杯中,端起咖啡杯,喝了一口,又喝了一口,喝的仿佛不是水,而是有着醇厚香味的咖啡。

也是那次伊春之行,会议结束,我们都在大厅里等大巴来接我们去机场。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个行李箱,在一堆普普通通的或黑或蓝或红的行李箱当中,有一个行李箱特别引人注目。它有着蓝色的底色,左下角一簇白色的野菊花或高或矮,粲然地开着,雅致而自带芬芳的感觉,而行李箱的右上角,一朵菊花,独自默然开放,尤为引人瞩目。而这个行李箱的主人就是梅老师。我因为好奇凑近了看,原来是梅老师为自己的行李箱量身定做了一件外套。那,那真的是很“梅老师”的行为呀。

多少年过去了,闭上眼睛,梅老师讲故事的声音,还会在我耳边响起:“我爱你,一直到月亮那里,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。”

认识梅老师,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!

父亲走得那么突然,因为车祸,什么也没留下。到了知天命的岁数,我不恐惧死亡,但却害怕告别。

大险当日,我没有选择哀乐,而是用一首蒙古族民歌,为父亲送行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,父亲晚年喜爱上了泡KTV,去唱歌时,每每必点,他曾对我说,听到这首歌,就好像回到了天峻,那是他魂牵梦萦的草原。

儿时,对父亲的记忆最深的便是门前拴着的马。那是爸爸的交通工具,天峻草原深处的牧区生活,马是主人远行或归家的信号,和信件一样有特殊的意义。遇到大雪封山,在家门口守候下乡归来的父亲,看一看那矫健的身姿,是一种痴痴的念想。父亲和草原的不解之缘起始于1958年,尚在读高中的父亲毅然响应国家的号召,奔赴柴达木盆地,投身祖国大西北建设,在那里认识了母亲,一起组建了家庭,从大柴旦、天峻一路干到德令哈,走过了激情岁月,走过了动乱年代,走过了开放时期,亲眼见证了荒漠变绿洲,目送着儿女成长。作为共和国支边的那一代,都背负着长子的责任;作为新中国最早“走西口”的上海人,又有着细腻的情怀。当年,他和母亲用微薄的高原工资和补贴,同时养育着沪、青、川三地多个家庭的子女,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空,儿女出门在外,亲人两地分居,父亲总不忘叮咛和嘱托,骨肉长大成人,家族薪火传承,他为我们弟兄仁起的名字,都带有三点“水”,常常告诫我们,我们从小喝着青海湖和黄浦江的水长大,无论走到哪里,都不能忘记。从上海到青海,从青海到上海,这个来回,父亲携着母亲的手,走了近半个世纪。

父亲晚年退休在上海,但是,说起大西北的往事,总是清晰如昨。他最喜欢草原上的“蹄花”,流淌在天峻草原的布哈河,是一条同时养育着蒙古族、藏族和哈萨克族兄弟的母亲河,复牧场繁花似锦,冬牧场千里银装,草原上有看不尽的野花,说不完的故事。20世纪50年代的边疆生活,堪称血浓于水的大融合。父

父亲走了,如当年下乡,放马由缰,出了远门。他心中有一座山,那是他最喜欢的昆仑,在父亲的笔下,他曾深情地写道:“昆仑不像峨嵋娇艳恹恹,而是那样襟怀坦荡,恢宏宽广;昆仑不像庐山苍茫玄虚,而是冰清玉洁,洒脱奔放;昆仑不像西湖倩兮纤丽,而是笃实凝重,气势磅礴,昆仑不像江南绚丽多彩,但他有别样的雄姿神态,给人以矜傲隽永,粗犷豪迈的丰厚感。”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身影,在我心里,他没有远离,只是不再归来。不管身在何处,我们毕竟是高原的孩子,每每回首西望,总是泪眼朦胧。

父亲走了,如当年下乡,放马由缰,出了远门。他心中有一座山,那是他最喜欢的昆仑,在父亲的笔下,他曾深情地写道:“昆仑不像峨嵋娇艳恹恹,而是那样襟怀坦荡,恢宏宽广;昆仑不像庐山苍茫玄虚,而是冰清玉洁,洒脱奔放;昆仑不像西湖倩兮纤丽,而是笃实凝重,气势磅礴,昆仑不像江南绚丽多彩,但他有别样的雄姿神态,给人以矜傲隽永,粗犷豪迈的丰厚感。”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身影,在我心里,他没有远离,只是不再归来。不管身在何处,我们毕竟是高原的孩子,每每回首西望,总是泪眼朦胧。

父亲走了,如当年下乡,放马由缰,出了远门。他心中有一座山,那是他最喜欢的昆仑,在父亲的笔下,他曾深情地写道:“昆仑不像峨嵋娇艳恹恹,而是那样襟怀坦荡,恢宏宽广;昆仑不像庐山苍茫玄虚,而是冰清玉洁,洒脱奔放;昆仑不像西湖倩兮纤丽,而是笃实凝重,气势磅礴,昆仑不像江南绚丽多彩,但他有别样的雄姿神态,给人以矜傲隽永,粗犷豪迈的丰厚感。”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身影,在我心里,他没有远离,只是不再归来。不管身在何处,我们毕竟是高原的孩子,每每回首西望,总是泪眼朦胧。

1946年6月发行的《大同开篇汇集》里有一个开篇叫《暴落难》,唱的是旧上海各地方人是怎么艰难讨生活的。其中有浦东人“卖黄瓜茄子(落苏)鸡毛菜”;常州人“摆副酒酿圆子摊”;宁波人“早晨头小菜场上摆黄鱼摊,下半日黄浦滩摇摇小船板”;无锡人“挑副油豆腐线粉担”;常熟人“卖马桶豁瓮水磨筷”;山东人“出把戏讨铜板”;南京人“摆摆教门牛肉担;荡口人,清早起来车子推,到弄头弄脑一声喊,三层楼(马桶)快些拎下来。”……其中提到江北人“出世第一趟到上海。落难只好拿黄包车子推。不懂大转弯小转弯。拔拉安南巡捕挠(撬)照会”。旧上海法租界里由安南巡捕维持治安,英租界里就是“印度阿三”。安南即今天的越南,我们吃的胖大海,旧称“安南子”,就是那里出产的。

今天听到评弹宗师张鉴庭唱的《暴落难》,唱词有些改动,但是基本还是能还原当时各地方人的旧貌。唱到江北人在上海拉黄包车,唱词是“上海额拉车子交关难,红灯要停,绿灯好拉过来,还有大转弯搭小转弯,倘使大转弯拉仔小转弯,安南巡捕要撬照会”。左转是大转弯,右转是小转弯,如今也是这样。这就很容易给人一个误会,即左大右小,以左为上。

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有一句话,蔺相如真的当上了上卿“位在廉颇之右”,为此廉颇非常不服气。成语“无出其右”,指的是没有能超过的,出处见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。“贤赵臣田叔、孟舒等十人,召见与语,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”。可见古人以右为上,与“大转弯小转弯”的方向正好相反。

我国最早的车相传为夏代奚仲所创,目前出土最早的是商代晚期的车,车厢虽不高,车轮却很高,轮径平均为1.35米,两轮间的轨距也有2米以上。可想

而知,驾驶这种车是一项专门的技术,驭者往往以右手控制车辆为主,这样坐在右侧的人势必会受到些影响,乘坐就不舒适了。若还以右为尊,就会在实际驾驶中带来不便。于是,在驾驶中就以左为上,以右为下。尊贵的宾客就坐在左手,左转也叫大转弯了。当然,今天开了汽车,也有一个直观的感觉,向左转转的弯比向右转转的弯“大”,左转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大转弯”了。以左为大的误区就这么产生了。

无独有偶,在座席序列上,也有一个“以左为大”的误区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提到“古人之坐,以东向为尊”即在房间里以面向东边的座位为尊,之后依次为面向南边、北边和西边的座位。这一座次在鸿门宴中得到佐证。当时项羽和项伯朝东面坐,范增朝南面坐,刘邦朝北面坐,张良朝西面坐。如果按此画一张方位图,就会发现坐在项羽项伯左边的范增地位比坐在右边的刘邦地位高。以左为尊的误区就产生了。其实,这是和东南西北的方位有关。

看到朋友在讨论印章的边款为何多刻在印章左侧。邓散木《篆刻学》里提到了边款的位置“署款有一定之面,刻一面者,必在印之左侧,刻两面者,则始于印之前面(向内),而终于左侧,刻三面者,则起于右侧,终于左侧,刻四面者,起于印之后面(向外)而仍终于左侧,其刻五面者,同刻四面,而终于顶上。亦有署款于顶上者,大抵印材略扁而无纽”。我们想到的问题,前辈艺术家早就为后人想到了。其中提到的三面边款“起于右侧,终于左侧”没有说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,但是四面边款“起于印之后面(向外)而仍终于左侧”可知,应该是顺时针。同时还讲到“顶款”的原因或为印章偏偏,若把文字刻在侧面或有过于逼仄之虞。

大转弯小转弯

施之昊

灿烂的历史令人着迷,不管窗外是风霜还是酷暑。

品质生活 责编:殷健灵

十日谈